

第一章 前 言

第一节 国 情

中国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江泽民同志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有的国家“想学我们，他还学不了，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

国情，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性质，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依据。

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个什么样的国情呢？

中国自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至今已有 3 000 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在 16 世纪初已从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但中国始终处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终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以农业为基础；始终是以农民为社会的主体。在这样的社会里，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它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个社会里，农民既进行农业生产，又进行手工业生产，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1949 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 90%，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 58.5%。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 70%，在仅有的 30% 工业产值中，现代

工业占 77%，手工业占 23%。正像毛泽东说的，是“一穷二白”。

为了使农民在经济上也能翻身，按原先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了土改，做到“耕者有其田”。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一化三改”——实现国家工业化，实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引导由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组织起来，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时党的主要领导思想方法开始“左”了起来，忽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忽视我国还未实现工业化，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国；忽视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抓住“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放，放弃原先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大搞剥夺农民利益的“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大搞不实事求是的“大跃进”。邓小平同志 1985 年 4 月 15 日在接见坦桑尼亚副总统时说：“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整整 20 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978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 250 美元。”^① 1978 年我国农村国民生产总值按农业人口平均才 156 元人民币，农民人均纯收入 134 元，人均口粮 250 千克（粗细粮、原粮），如按联合国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10 美元为低收入，我国农民可说是属于‘赤贫’。据世界银行《1982 年世界发展报告》说：1980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低于 1955 年时的水平；1955 年中国占世界份额 3.2%，1980 年为 2.5%^②。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十分重视农民、农业、农村问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卷，第 115 页。

世界银行：《1982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 页。

题，都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国国情，探索着解决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办法。在不同时期，认识符合国情和实际，采取的方针、政策又对头，经济就发展，农民就增收，农村就稳定；否则，就要碰钉子、吃苦头，挫伤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

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是在全国实行工业化，使农民流入城市当工人，形成工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留在农村的少数农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5% 左右，他们靠实行农业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科学化、市场化的集约经营，使农民的收入提高，消灭了城乡差别。

但我们中国情况不同，农民多，耕地少，1955 年全国有农民 5.3 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7%，而耕地只有 1.1 亿公顷，人均只有 0.21 公顷；当年现代工业产值也只有 447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 44.6%。中国解决农民问题，不能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老路，也实行工业城市化，让大多数农民进城当工人，农业由少数农民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经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城市容纳不了这么多农民。中国必须根据具体国情，另想他法，另谋出路。

第二节 发展乡镇企业是必由之路

在现代工业未发展以前的封建社会，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除农业外，手工业是第二生存来源。在世界产业革命初期，当时以手工业为主，中国工业产值（实际是手工业产值）居世界首位。手工业在中国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普遍、发达，手工业工人也相当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农村集中的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成立了手工业社。分散的手工业者，分别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内组成副业队或副业组，进行手工业生产和进行农副产品加工（见表 1-1）。

表 1-1

年 代	手工业产值	农产品加工产值	副业总产值
1952	18.3	62.6	80.9
1953	19.6	68.5	88.1
1954	19.7	70.4	90.1
1955	21.1	76.2	97.3
1956	22.6	76.2	98.8
1957	22.9	76.8	99.8

资料来源：农业出版社 1959 年《农业经济资料手册》。

1952 年副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16.7%。1957 年虽然产值增加了 23.4%，但比重反降为 16.5%，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一大来源。当时农村手工业是包括在农业经济范围内，农忙时就从事农业劳动，农闲时就从事手工业劳动；手工业有活就干，没活就干农业；分配办法是评工记分，按分在农业社内统一分配。这种副业生产，可说是后来发展乡镇企业的“胚胎”；乡镇企业发展，就是从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开始的。

中国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工业化，既不能走西方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也不能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在城市办工业，实现城市工业化，人口城市化。因中国农民太多，这样做不仅国家负担不起，就是城市也容纳不了这么多农民。出路，就是允许农民在农村办工业，在实现城市工业化同时，也实现农村工业化。

1958 年，毛泽东同志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尽快实现工业化，增强国力，摆脱被人看不起和挨打的境界；为了探索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使农民过上好日子，提出“以粮为纲”、“超英赶美”实现工业化的大跃进运动，提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成立人民公社，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发展社办工业，为两个“过渡”奠定物质基础等不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一些过早、过急、过“左”的做法。就是在这些思想主导下，毛主席首先提出“社办工业”、“公社工业化”。由于这

种脱离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后退，大后退带来了大灾难，使国民经济全面大倒退，成千上万的人不正常死亡，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极大的灾难和损失，使人民吃尽了苦头，一时国家经济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取紧急措施，扭转危局，为加强农业第一线，把刚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也下令“公社和大队一般不办企业”，给解散了。但是毛主席的农村工业化思想却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大浩劫，是一大破坏。但它也有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农村失去领导，失去控制，农民利用这个空隙和机会，为了生存、为了给剩余劳动力找出路、为了脱贫致富，他们冒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又在农村自发的试办起社队企业来。这中间虽受多次批判和失败，但终归站住了，发展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的第二代领导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提出要加快农业发展和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从此才使社队企业这一农民办的企业才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党和政府的支持，有了发展的机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搞活的始发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始发点，同时还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展非国有经济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始发点，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由于人们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束缚，受“左”的思想影响，受旧体制、旧思想、旧观念、旧意识的制约，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由于它是非国有的农民办的企业，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经历了“四上四下”的波浪式发展。

在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决定》提出：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后，特别是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使社队企业合法化，调动了农民办社队企业的积极性，1980年以20.5%的发展速度上了第一个台阶；后由于国家纠正“洋跃进”，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些部门利用调整之机，站在局部立场，说社队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与国有企业争能源、争市场、争资金、争原料”，提出要砍小企业，使社队企业发展速度1981年降到10.5%。此时，国务院有针对性地颁发了《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特别是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通知的发出，决定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由过去“两个轮子”（社办、队办）改为“四个轮子”（乡办、村办、联合办、个体办）后，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猛增了68.1%，上了第二个台阶；但由于国民经济出现“四个失控”（基建投资失控、信贷失控、外汇失控、消费基金失控），有的说“四个失控”是乡镇企业造成的，对乡镇企业贷款实行“砍一刀”，使1986年乡镇企业增长降为30%。在邓小平同志对乡镇企业作了“异军突起”的高度评价后，1988年乡镇企业又抓住这一机遇，使发展速度又上升到41.8%，上了第三个台阶；但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有的说乡镇企业是“非公有制经济”，提出“坚决压乡办工业，保国有工业”，使1990年乡镇企业发展降为14%。1992年国务院召开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会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乡镇企业又抓住这个机遇，使1993年乡镇企业增长达到78.6%，上了第四个台阶；但到1997年由于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乡镇企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紧缺，造成发展速度下降，1997年下降到18.2%。

回顾这段历史，每次下降，除第四次外，主要都是因外部原因造成的；每次能上一个台阶，都是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措施，乡镇企业抓住每个机遇不放，才能上台阶、

大发展，才有如今的“半壁河山”地位，才有“必由之路”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评价。

乡镇企业名称，在人民公社前叫社办工业，人民公社初期叫公社工业，20世纪60年代到1984年叫社队企业，从1984年3月开始叫乡镇企业。

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原先并没有什么模式，也没有什么范围，更不是想办什么就可办什么的，而是在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左”的思想争斗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扩大经营范围的过程，是一个由小到大、由手工生产到现代化生产、产品质量由低到高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是乡镇企业自身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过程。

从办乡镇企业的出发点来说，在人民公社化以前，发展社办工业，是为了加快地方工业发展。人民公社运动时期，是靠政府命令，为了实现两个“过渡”办社办工业。文化大革命时期，公社和生产大队办企业，是为了壮大集体经济，由公社和大队自发办起工业；生产队办工业，除了壮大集体经济外，还为了增加收入，发展农牧业生产，增加社员分配收入。当时个人办企业，是不允许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实行联产承包，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现；这时农民自发办起了个体企业或联合体企业，其出发点一是为富余劳动力找事干；二是增加收入，脱贫致富。

从生产设备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社办工业没有现代机器，完全是手工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文化大革命”时期，社队企业用上了机器，但因那时机器是国家计划分配物资，不卖给农民办的社队企业，社队企业的设备，一是靠买废旧设备拼装；二靠自己制造的土设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靠正路还是买不到机器，于是靠老乡、靠关系，这样少数企业才有了少数现代化的机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社队企业为国营企业带料、带设备加工，后为港、澳、台和外国工商业企业带料、带

设备加工，加上当时国营机械工厂生产的设备积压卖不出去，于是乡镇企业才可买到，这样乡镇企业才普遍用上了现代机器装备。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从国外引进了八九十年代的最先进设备，这才把乡镇企业装备水平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当然这样的企业还是少数。

从乡镇企业分期来说，有几种分法：有的按乡镇企业发展过程分为：萌芽期，生长期，复苏期，发展期，壮大期，提高期。有的按国民经济几个大的阶段分为：人民公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有的分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社队企业诞生和发展，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乡镇企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有的按大的历史阶段分为：人民公社化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中央四号文件时期，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期。本书为真实反映乡镇企业发展历史，按乡镇企业发展重大事件来划分。

第二章 农民办工业和农村工业化

第一节 历史背景

中国在农村发展工业，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1955 年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将要完成时，毛泽东产生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思想，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写道：“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① 随后他还说要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为什么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提早完成工业化，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为了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使东风压倒西风。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形成两大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国际形势由过去“热战”变为“冷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当时取决于这两大阵营各自的实力的较量和竞争。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世界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册，第 485 页。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主席说：“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① 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重要产品的产量。随后毛主席在11月16日大会讲话中说：“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一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②

第二，为了增强国力，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再不被人看不起。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工业虽有了一定恢复和发展，但国家的工业现状和我们这个大国地位不相称，按人口我们在世界是第一，但是我们工业品产量只占世界钢的第九位，煤第五位，原油第二十三位，发电量第十三位，水泥第八位，化肥第三十三位，布第三位，汽车、拖拉机、家用电器还不能生产；按人口平均，少得可怜，原煤0.2吨，原油2.3千克，发电量29.8千瓦小时，生铁9.2千克，钢8.3千克，布7.8米；和发达国家比，相差就太远了。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使人民尽快富裕、国家尽快强盛起来，再不受人欺凌和挨打，农民再不为吃穿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册，第63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册，第635页。

发愁，毛泽东同志作为国家主席，急于把经济搞上去，是可以理解的。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讲话说：“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来了，今年是四百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有差不多一百个国家，但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钢、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① 1963年9月毛泽东还从挨打的角度曾说过这样的话：“如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295~296页。

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以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们社会经济落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①

第三，尽快使农民摆脱贫困，吃饱饭，富起来。据毛泽东警卫李银桥回忆，1957年警卫队一位战士回家探亲回队，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他向毛主席说：我们家乡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种窝窝头。毛主席眼圈红了，手抖着接过窝窝头，一边分给大家吃和自己吃，一边说：“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他思考着说：“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己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解放么。”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②

第四，不要依靠别国，还是靠自己发展。

第二节 社办工业的提出

195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九省二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简称南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讨论1958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会上地方的同志强烈要求发展地方工业。毛泽东从全局考虑，同意发展地方工业，并在会上提出：“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计划。”随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8~849页。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的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①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工作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小组会上对发展地方工业，作了较系统的阐述，他说：“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如果“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厂矿。”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么办。工业生产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这里首次提出了“社办工业”“乡办工业”的概念。

自从毛主席在南宁会议提出发展地方工业后，国家经委就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立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该文件起草好后，3月23日成都会议讨论通过，后又经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下发执行。

《意见》首先指明了发展地方工业的意义，它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明确的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援；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

《意见》关于工业企业布局指出：“在中心城市、基点县以及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5、48页。

其他各县的同产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网。”

《意见》关于工业企业的形式指出：“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为此，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现在县以下工业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县营、乡营，合作社（农业社或手工业社）营，县、社或乡、社合营等三种。”

《意见》首次提出了社办工业，它指出：“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品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①

毛主席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讲话和中央这个文件，一方面对我国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合理布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富民强国，确实在实践中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在理论上也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工业化理论也是一大发展，冲破了由国家统一办工业和在城市办工业的束缚，提出了“群众办工业”、“社办工业”、“乡办工业”的主张，它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对 1958 年地方工业遍地开花，起了很大的鼓动和推动作用。如工业不发达的甘肃省，1958 年 2—3 月，全省办厂 1 000 多个；3—5 月，全省建厂 3 500 个；5—6 月，全省厂矿猛增到 22 万个，其中社办的 18.5 万多个。全省每个乡平均有 110 个厂矿，每个农业社平均有 12 个厂矿。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成 1 530 个厂，平均每天有 35 个厂投入生产。人口仅有 13 多万人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 1958 年 5 月底就建厂矿 307 个。^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 册，第 223~227 页。

以上事例转引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 57 页。

第三节 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工业的设想

关于 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公社办工业，1959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我有建议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查岌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名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①那么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谁？

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伯达在监狱交代，人民公社的“发明权”是他。据陈伯达谈，早在 1956 年冬，他到福建省莲塘乡搞农村调查，1957 年初在他给中央写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可以把乡村和农业社合在一起，使合作社成为真正的基层；可以把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并到农业合作社。他说：1958 年“根据当时接触过的一些材料^②，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办起了工业。又搞农业，又搞工业，这件事启发我想起恩格斯的一种著名的论点。例如，恩格斯说：‘……有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教育可使年青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再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③我想，既然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同时又搞农业，又搞工业（即“亦农亦工”，或“亦工亦农”。当时这纯粹是自发的，这些工厂

转引叶永烈：《陈伯达传》，第 218 页。

^② 指湖北省鄂城县委写的《旭光一社用土办法办小厂》、《旭光一社是怎样领导和管理小小工厂的》——作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12 页。

自认只是“小小工厂”)，而仅署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似乎不完全反映这种实在发生的情况。所以，我冒昧在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短文中，说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①我原来的设想就是这样。”^②

据胡乔木同志回忆，1958年2、3月，毛主席和陈伯达就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共产主义雏形谈过一次话。1958年8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的他在北大的讲话《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中说毛主席在1958年初曾设想过“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③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9日毛主席到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小屯农业社进行视察，当他们汇报打算把农业社合并成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此消息由新华社8月12日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一个组建人民公社的热潮，在全国兴起了。毛主席在看到报纸后，“忽然拍案失口喊到：‘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有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事后，有人提出问题，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是我讲的，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④

① 《红旗》杂志，1958年7月，第3期——作者注。

② 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17页。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3~224页。

8月29日经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由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大型的综合性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①

对人民公社由酝酿到成立的全过程的回顾，很显然是把农民办工业作为人民公社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可以说社办工业是人民公社的主要支柱，人民公社是社办工业的主要依托。

第四节 人民公社办工业的发展

自从1958年8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组建人民公社的同时，社办工业也随着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应运而生。

社办工业最初的组建，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农业社办的工业，无代价的全部转变为人民公社的财产，变为社办工业。例如甘肃省在人民公社组建前的高级社时期，在发展地方工业口号下，已办各种工业18.5万个。^②人民公社成立时，全部转为社办工业。第二，将农村原有手工业社，全部划归人民公社领导，成为社办工业。据有关资料，到1959年6月，转为社办工业的手工业社3.53万个。^③第三，用大搞群众运动搞工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46～447页。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67页。

季龙：《当代中国的集体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